

#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陈明明 / 著

## 在革命 与现代化之间

——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

 復旦大學出版社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 在革命 与现代化之间

——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

陈明明 /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陈明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309-11726-4

I. 在… II. 陈… III. 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7394号

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  
陈明明 著  
责任编辑/邬红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238 千  
201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1726-4/D·757  
定价:35.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陈明明，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党与政治发展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史等方向的教学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站站长、《复旦政治学评论》主编。

# 目 录

导论	1
一、高度集权结构特征的由来	2
二、高度集权结构的历史合理性	7
三、高度集权结构的政治后果	13
四、国家与社会分离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18
五、简短结语	25
第一章 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	
——党治国家的形成与革新	27
一、危机与革命时代的来临	28
二、总体决战与集体狂欢	32
三、党治国家的兴起	37
四、革命式现代化的理由	40
五、革命式现代化的悖论	47
六、市场型现代化与党的革新	51
七、简短结语	60

## 第二章 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

——关于政党及其革新的一项词语梳理 ····· 62

一、革命党与革命的现代性 ····· 64

二、统治党与统治形态 ····· 76

三、执政党及其话语约束 ····· 94

四、从统治走向执政 ····· 106

五、简短结语 ····· 119

## 第三章 党治国家：理由、形态与限度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 ····· 120

一、党治国家的概念与历史 ····· 121

二、“党治国家”的讨论：政党体制研究 ····· 130

三、“党治国家”的讨论：缘起与发展 ····· 140

四、组织话语的兴起与转换 ····· 152

五、国民党与共产党“党国体制”的比较 ····· 165

六、党治国家的限度 ····· 193

七、简短结语 ····· 209

## 第四章 再论“革命”、“统治”与“执政”

——关于政党变革的两个命题的讨论 ····· 211

一、命题的表达结构与同异 ····· 212

二、“局部执政”与“全国执政”辨析 ····· 215

三、“统治党”：一个三分结构及其意义 ····· 222

四、从“统治”走向“执政” .....	227
五、简短结语 .....	232
<b>第五章 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结构：冲突与调适 .....</b>	<b>234</b>
一、价值结构的三个要素及其规定 .....	235
二、有机统一：结构内部的张力 .....	239
三、环境变迁与结构调整的取向 .....	245
四、党内民主与执政方式改革 .....	253
五、结构要素的新意涵 .....	259
六、简短结语 .....	262
<b>第六章 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变迁 .....</b>	<b>264</b>
一、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轨迹：一个简要综述 .....	264
二、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及其变迁的内容 .....	274
三、主流意识形态与党治国家的统治绩效 .....	282
四、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及其“现代传统”的制约 .....	290
五、简短结语 .....	293
<b>结束语 .....</b>	<b>294</b>
<b>参考文献 .....</b>	<b>305</b>

## 导 论<sup>①</sup>

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党在当代政治生活中也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既与政党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变迁性质相连,也与政党自身结构功能的历史规定性及其调整取向有关,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些挑战称为危机是恰如其分的。政党研究学者指出,政党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如此,东方也如此,一党体制如此,多党体制也如此。<sup>②</sup>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中,这些危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原因。毋庸讳言,在中国,同样存在政党危机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前中共党内频繁而激烈的“路线斗争”无疑是政党危机的表征,在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条件下,政党危机波及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每一次危机爆发在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恢复政治平衡后又催生和隐伏着新的危机。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但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

<sup>①</sup> 原文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原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此处略有删节。

<sup>②</sup> 见 Ruth K. Scott, Ronald J. Hrebenar, *Parties in Crisis: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 John Wiley & Sons, 1984; Mattei Dogan, “Erosion of confidence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all 1997。另见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郭定平:《美国政党体制的衰落与改革》,载《复旦学报》,1992年第2期;施雪华:《论战后西方政党文化的新变化》,载《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



党的建设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是削弱党的战斗力、危及党的生存的直接因素。党内腐败及其导致党在重大政治事变面前软弱无力、对社会主义政权和事业所具有的严重性与危险性被 1989 年发生的政治事件所证实，以至于邓小平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sup>①</sup>明白无误地指出党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应该说，在这种危机中，腐败仍然是果而不是因，它与改革开放前的危机表现形式虽不同，但形成的根源是一样的，它属于一种政党结构危机，即党的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所带来的危机，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党结构在国家与社会一体的条件下会因为以党代政、党过多使用行政命令乃至高压手段而导致党内民主制度遭到破坏和国家权力的蜕变（以此可以解释“文革”及“文革”前的政治形态），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条件下会因为缺乏有效监督而导致权力对党的严重的腐蚀并因此削弱党与基本群众的政治联系（以此可以解释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治生活的某些重要变化）。分析和评价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党结构和领导体制，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二元分析框架中已有大量的文献，但从政治学上予以审察，似仍有许多工作可做。

### 一、高度集权结构特征的由来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政治结构及其调控方式都有它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都应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予以分析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归属定位一直遵循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党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党所领导和从事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定

---

<sup>①</sup>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载《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14 页。

位实际上为我们考察党的高度集权结构特征的成因提供了两条历史线索,即党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和与十月革命相连的中国革命环境的强制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与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从体制内,而是从体制外产生的,虽然普选权的扩大也是它活动的重要基础。作为工人运动的产物,它一开始就把批判和否定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依据,这使它具有鲜明的反体制特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迟早要让位于一个新的制度,这是历史的法则,无产阶级则充当这一历史法则的执行人。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规定的任务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①</sup>无产阶级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使命要求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sup>②</sup>这样一个政党必须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sup>③</sup>“特殊政党”的根本含义在于,第一,它在政治上维护和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的目标和政策,而不能成为某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sup>④</sup>第二,它是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2页。

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8页。

③ 恩格斯:《恩格斯致格·特利尔》,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9页。

④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0—441页。

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经由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精英）把革命理论从外部灌输给普罗大众，使无产阶级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sup>①</sup>第三，它强调“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而所有的教育、宣传和组织都是进行革命的手段。<sup>②</sup>显然，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中，党被赋予了高度内聚的特征，鲜明的纲领、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统一的行动——这些要素作为一种内在基因和遗传信息决定了后来共产党结构模式的基本倾向。

应该指出，虽然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但在他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在各个国家间并没有真正整合起来（第一国际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各个国家内部也远称不上是“一支严整的部队”（如各种派系与思想斗争）。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的政治生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诱惑和影响。无产阶级政党的反体制性质注定它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深刻的异数，也决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被排斥的边缘地位，因而需要以内部整齐划一和高度凝聚来抵御和应对环境的压力。从逻辑上来说的确是如此，但在欧洲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这种排斥既以政治高压如取缔、关禁、驱逐乃至屠杀这种极端的方式出现，也以“文化霸权”即主流意识形态、法律、宗教、舆论及其民间社会团体的控制渗透的方式出现。后者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更大，因为前者如俾斯麦德国一类的“反社会党人法”多半把工人阶级推向街头，它除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度震荡，从而锻炼和凝聚了无产阶级以外，别无所获；而后者却可以使无产阶

---

<sup>①</sup>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6页；另见列宁：《怎么办？》（第二、三部分），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5—311页。

<sup>②</sup>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0页。

级政党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从而把无产阶级不同的党派纳入可控的政党政治中,最终阉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态下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大困境是,党的目标要求根本改变这种政治生态,但党的活动却要依赖这种政治生态提供的游戏规则,而一定的游戏规则作为系统的功能又是以维持系统的结构关系为存在前提的。

列宁很早就认识到这个悖论。在第二国际内部的诸项论战中,无产阶级能否通过争取普选权参加资产阶级议会而合法地改造国家制度,最终取得政权,一直是最具争议性的论题。列宁指出:“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议会制度并不能以此促使危机和政治革命归于消灭,而是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最高限度地尖锐化。”<sup>①</sup>列宁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20世纪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的认知。如果说,在西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受到来自体制的结构性限制和文化性限制,但理论上毕竟享有合法角逐国家权力的地位,那么,在东方,由于不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既抗衡又妥协的社会政治生态关系及其所提供的政治空间,无产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被统治者认为是极度危险的,因而必须置于国家机器的严密监视之下,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通向政权的道路具有极其激烈的特点。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列宁何以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重起炉灶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才能理解国际共运史上马尔托夫与列宁关于建党的著名论争对各国共产党组建的深刻影响,才能理解共产党何以形成纪律严格、活动秘密、管理军事化的政党结构。列宁的政党理论

---

<sup>①</sup>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页。

是建立在俄国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特定任务(与沙皇专制制度斗争,而不是像西欧各国工人政党那样利用议会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斗争)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党必然按“秘密工作”的要求发展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而不能像马尔托夫那样“把各色各样的人都变成党员”;必然强调党的高度集中与高度统一,而不能像孟什维克那样把党建成西欧模式的“群众性政党”。正因如此,人们通常把“党建学说融入革命行动理论”视为列宁主义的最深刻的特征之一。

列宁是共产国际的奠基人,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与中国又极为相似,如果说列宁式政党是俄国革命的必然选择,那么它对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历史上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和中国革命的巨大示范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程度较之俄国更低,“封建专制”较之俄国更甚,在中国更不存在西方政党政治的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sup>①</sup>中国在“源”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类似西方国家竞争性的社会政治生态,在“流”中又堵塞了这种竞争性社会政治生态的建构之路。中国现代史上曾有过民国初年短暂的多党政局,但它完全是缺乏社会内生基础的模仿性的政治泡沫,转瞬即逝。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似乎显现出某种政党竞争的格局,然而一方是强权政治,一方是武装割据,与西方政党政治中的“执政”、“在野”概念有天壤之别。战后的“联合政府”方案可能最接近西方政党政治的蓝图,但未及实践,即夭折于内战炮火中。因为在国民党的政治辞典中,实际上没有所谓“在野党”、“反对党”之说,

---

<sup>①</sup>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507页。

只有“奸党”、“匪党”之义。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不能不在体制外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而体制外动员最好而又最现成的蓝本就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建制及其革命运动。在中共革命中，列宁这段名言经常见诸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献中：“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sup>①</sup>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列宁式政党的原则组建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列宁式政党原则的有效性，这种“路径依赖”使党必然日益趋向高度集中和严格纪律。在国共决战的前夜，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即提出“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sup>②</sup>“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sup>③</sup>显然，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和革命环境的强制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集权和垂直动员的组织结构特征。

## 二、高度集权结构的历史合理性

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集权结构特征的

---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0—201页。

②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24页。

③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288—1289页。

成因,更多是一种发生学上的分析,但是,党何以在掌控政权后,其高度集权的结构特征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日趋强化,还需要把上述两条线索置入百年中国自身发展的逻辑中一起来审视。

20 世纪的中国有两项任务:扭转自 19 世纪中叶以后社会政治秩序溃散的趋势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这两项任务是相互依存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环境,经验和理论表明,这样的环境通常是由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集权政体提供的。然而自晚清以来,传统的秩序在世界性现代化的挑战面前即告分崩离析,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未能挽救这一颓势,反而加剧了中央权力的衰败,地方主义的盛行。中国不仅出现了比较政治学者所概括的后发展国家转型时期的五大危机(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整合危机),<sup>①</sup>而且在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这些危机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于是,从政治改造入手,寻找根本解决途径便成为中国现代化精英的选择。这也是改良主义在中国始终无法取代激进主义成为主流思潮的原因。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学者指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最有效的办法是采取“全能主义政治”的方式,即“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制度与组织,才能解决问题,克服全面危机”。<sup>②</sup>撇开“全能主义政治”这一概念的特定内涵不论,这种分析理路的确触及中国发展的逻辑。这样我们便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中,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列宁式

---

<sup>①</sup> 见 Lucian W. 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6, pp. 62-67.

<sup>②</sup> 邹说:《中国 20 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载《思想家:跨世纪的探险》,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9 页。

政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事实上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被用来作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坚实权威基础的手段。

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两个转变,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和“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须经历一个利用资本主义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文明成果进行现代化积累的中间环节。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最初也是接受列宁的理论和苏俄的经验。毛泽东很早就表达过这一思想: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个独立的时期,前者为后者的到来作经济文化上的准备,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工业化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sup>①</sup> 问题在于,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在这里却成为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工业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本积累,规模庞大的资本投入是工业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但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社会资源极为匮乏、人口规模超大与社会资源总量贫弱尖锐矛盾的国度。资源总量不足带来的社会分配的强大压力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倾向于采取“赶超型模式”,而“赶超型”工业化对资源供给的需求又极为迫切旺盛,而且由于革命后的新政权处于外国势力的封锁包围与内部敌对及传统势力的抵抗之中,因此工业化不能不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义:第一,与许多早发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不是来自社会的自组织力量,而是来自一定的政治权威,1949年的革命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权威。第二,正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不是来自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因而以上所述的“全能主义政治”,即政治系统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渗入和控制社会每一层面和每一阶层便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

---

<sup>①</sup>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626、632—633、644页;《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009、1030页。



然性。第三，中国现代化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性质，其目标不仅是要告别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农业文明，而且要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一套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积聚起来的巨大的政治权威、对革命中人的主观能动意志的创造性的深刻记忆和自信，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渴望产生了对这种发展瓶颈本能地采取政治解决而不是经济解决的要求。于是，过渡时期党的发展战略发生了转折。在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表述中，原先两个独立的时期及其各自任务的逻辑关系开始变得模糊，而以生产关系改造促进生产力发展、以上层建筑革命引领经济基础变革的思路却日益清晰起来。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sup>①</sup>这样，以工业化对社会主义创造经济基础的战略构想，被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战略实践所取代。社会主义改造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因此，这种战略转折的意义在于，它凸显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革命”的性质，弱化了“发展生产力”这一历史主题在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社会确立进程中的决定性地位。中国现代化的这种特殊逻辑

---

<sup>①</sup> 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5—406页。